

罗 维 © 著

百年文学 匪类叙事研究

BAINIAN WENXUE

FEILEI XUSHI YANJIU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罗维◎著

百年文学

匪类叙事

BAINIAN WENXUE

FEILEI XUSHI YANJIU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选择了匪与文学这样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历史联结进行研究。第一,考察现当代中国文学对于民国时期土匪、强盗的审美表现,系统地对现当代匪类叙事的发展变迁进行梳理和阐释,并有针对性地分析代表作家作品的个案,如沈从文、姚雪垠、东北作家群、艾芜、杨争光、苏童等的土匪题材小说。第二,试图解决以下问题:(1)现当代文学是如何建构土匪的审美形象的,如何在时代的演进下展开对土匪的想象的,这些文学叙事具有怎样的审美特征和审美品格;(2)这种文学叙事反映了作家、时代、社会之间怎样的历史文化关系,体现了怎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作家怎样的创作意识,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理性方式批判对待这一文学叙事后面所潜藏的文化心理意识。

责任编辑:蔡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研究/罗维著. —北京:知识
产权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130-0424-4

I. ①百… II. ①罗… III. ①中国文学—土匪—人物
形象—文学研究—20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118号

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研究

罗维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4

印刷: 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本: 720mm×960mm 1/16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字数: 283千字

ISBN 978-7-5130-0424-4/I·131 (3339)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caihong@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5.5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摘 要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帝制终结，民国肇始，政治空前动荡，造成了乡土中国各地政治权力真空状态，这就给各种民间的武装力量以机会，于是各地匪患猖獗，“土匪世界”之名由此而来。“匪”成为了乡土中国一个深深的伤口，亦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一道黑风景。

本书借鉴了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理论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匪类文学叙事进行思考和分析，力图揭示出匪的文学想象作为政治、文化的审美镜像，所反映的作家与社会、政治与文学、作家与文学之间种种互动关系。

本书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了“匪”的概念起源、发生和历史变迁。匪文化作为一种民间的亚文化传统，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兼爱天下的墨家精神，而《水浒传》作为集大成的绿林文学的代表，是民间匪性文化心理的一次审美的集中表现和爆发。

20世纪初期，由于民族危机造成的文化焦虑，民族自信心的空前匮乏以及知识分子的政治边缘化状态，也由于他们精神和思想结构中的西学资源和民间传统的共同作用，匪性文化意识不经意地出现在那些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主张中，并且往往不为知识分子们自身所察觉。这包括：知识者理性中对匪之“恶”的认同，它成为了启蒙话语的一种资源；匪性所具有的破坏的激情，成为了中国现代革命意识的话语资源；匪在民族救亡话语中也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其原始生命强力被知识者们视为更新民族气质、注入民族活力的希望。可以说，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中始终有匪性意识的存在。

文化语境的形成势必影响关于匪盗的文学想象。在现代启蒙话语中，现代作家开始以全新的现代意识、历史精神，以及现实批判精神展开匪色想象。匪色文学想象中包含了知识分子以启蒙立场对于下层和民间的关注，以人道主义立场对于土匪世相的悲悯，也体现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民族焦虑，还是知识分子开放人格的镜像体现。不仅如此，进入到新中国时期后，新的政治、文化变迁又导致了当代文学匪色表达中新的思想维度的产生，这包括

十七年文学中所体现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匪色想象的规训，新时期以后匪类文学叙事中所体现的民间视角和新历史主义视野，以及作家们对于人性和民族性的关注，对于匪性意识的解构和反思等等。

根据匪色想象在 20 世纪的嬗变过程，也由于匪现象与政治史的密切关系，本书主要分三个时期来论述，即民国时期、“十七年文学”时期和新时期，它们分别对应了匪类文学叙事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

本书力图对 20 世纪匪类文学叙事进行细致描述和精确勾勒，同时对脱离匪的现实继而进入形而上层面的民族匪性文化意识进行揭示和反思，得出的结论是：深植于民间内部的匪性文化意识没有可能成为更新民族气质、推动民族发展的文化品格，其匮乏→仇恨→暴力的产生机制注定了其悲剧性的命运。我们需要反思匪性赖以形成的仇恨和暴力根源，创建一种更为健康和开放的民族文化心理。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现代匪想象的历史起源	(10)
第一节 “匪”字考古	(10)
第二节 最早的匪想象——盗跖	(18)
第三节 民间匪文化的思想渊源	(22)
第四节 《水浒传》对现代匪类叙事的影响	(31)
第二章 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综论	(37)
第一节 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的文化语境	(37)
第二节 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的转型准备	(54)
第三节 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的嬗变轨迹	(61)
第三章 对匪与匪性的现代早期追问与思考	(88)
第一节 阿Q的启示——人皆有匪性	(88)
第二节 《到何处去》：民国乡村匪患的真实写照	(98)
第三节 是革命还是造反——早期革命文学话语中的匪想象	(102)
第四章 “土匪也是人”——现代匪类文学叙事的审美转型	(107)
第一节 《南行记》：江湖与人生	(107)
第二节 《长夜》：进入历史言说的土匪	(112)
第三节 《荒野》：乱世之中的匪性、人性与诗性	(131)
第四节 沈从文：悲悯观照下的土匪世相	(136)
第五章 土与匪：地域文化与现代匪类文学叙事	(147)
第一节 乡土中国的一道黑风景	(147)
第二节 端木蕻良：原始生命力量的高歌	(154)
第三节 萧军：匪侠文化的现代演绎	(161)
第四节 《死水微澜》：四川袍哥的文学形象	(165)
第六章 红与黑：政治化审美想象中的匪类形象	(169)
第一节 十七年文学中被驯服的匪性	(169)

第二节	匪可貌相：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土匪外貌修辞·····	(175)
第三节	一个异数：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	(185)
第七章	建构与解构：新时期以来的匪类叙事·····	(190)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匪想象·····	(190)
第二节	《米》：游民生存哲学的残酷展示·····	(195)
第三节	匪想象与乡村暴力文化的批判·····	(198)
第四节	匪类叙事中的性与女性·····	(207)
结 语	·····	(215)
附录	论民国湘西军人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	(223)
参考文献	·····	(234)
后 记	·····	(238)

导 论

小农经济的宗法制社会，古风古德的乡民，美善宁静的乡村，鸡犬之声相闻，牧童短笛，炊烟袅袅，到了一定的日子，村庄里会请一台社戏，那是让小时候的鲁迅终生都难以忘怀的农家孩子的欢会……

传统中国一贯给人以这样一种静穆美善的乡村印象。这是一幅基本的整体的传统中国社会素描，虽然上面还需要添加改朝换代的种种不和谐细节，但“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时间的流逝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过传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格局，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铸就了温良恭俭让的家族宗法伦理文化和桃花源似的乡村生活理想。

但如果对历史稍有留意，会注意到在这个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舞台上隐隐绰绰有一个让人恐惧而又神秘的身影，它占据着人们的意识，却在历史中没有位置；它被不断加以言说，却无法为自己申辩；它在社会秩序之外逍遥为王，却又只能在他人的话语权中任人打扮曲直。它是另类的黑色风景，却又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段历史、每个人的心里潜藏。

它是什么？它是土匪。

“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①当年闻一多先生对于英国历史学家 H. G. 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一书中的这句话极为认同。这一观点确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将土匪对于中国人文化人格的影响力和儒道文化等量齐观。在此之前，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即来自中国民间的匪性文化传统和文化意识力量之大，它和上层的精英文化同样在左右着这个表面上温柔敦厚、严谨守礼的民族。

类似于韦尔斯的观点在当代学者那里有更深入的阐释，只不过表述方式有一些区别。当代学者李慎之就如说是说：

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

① 韦尔斯，人类的命运 [G] //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这样的中国社会被称为隐性社会。^①

问题在于韦尔斯所说的“土匪”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它和李慎之所说的游民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韦尔斯所言的“土匪”涉及两个层面的概念：第一当然是指现实层面的民国时期土匪大量存在的事实——即作为社会现象的匪。民国时期的中国匪患极为严重，这是人所共知的。西方人对于中国游民匪盗的了解多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现实状况。当时，从地域上说，东北的胡匪、东南的海盗，江河的水匪，四川的“袍哥”、“棒客”，湘西的会匪等等遍及各个省区。从时间上看，土匪活动贯穿整个民国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中华民国由此被西方国家视为“匪国”、“土匪世界”。1923年成功劫持了西方人质作为筹码的山东大土匪孙美瑶制造的临城劫车案很具有代表性，震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

但韦尔斯所指的“土匪”不仅仅是具体的中国社会某一类型人群，更是一个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概念，它是一种特定的民间文化意识的代名词，这种民间文化意识就是李慎之所说的“游民社会”的意识，它来自于乡土中国大量存在的游民阶级。什么是游民？按照当代学者王学泰的界定，游民是指“由于各种原因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来的人们”^②，是毛泽东所说的“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③，土匪、强盗、流氓则是游民中最具反社会性、最腐败也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因此我们可以说土匪即是游民的典型。对于这一社会类群的特点，现代社会学家萨孟武说得极为形象：

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但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④。

这是一群生活方式和传统社会中的四民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暴力性，能够形成一种民间势力。毫无疑问，游民大量存在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非常混乱和无序的社会。王学泰这样讲到游民（土匪）与社会的关系：

① 王学太.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1.

② 王学太.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13.

③ 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G] // 毛泽东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④ 萨孟武.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社会是一个有序的机体，当一个社会的合理性逐渐消退的时候，它的无序性日渐增加，直到自然或非自然的解体为止。游民是导致社会无序性激增的恶性肿瘤，是社会无序化和社会制度腐败的产物。^①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有游民的存在，只是多少的问题，社会安定、社会秩序稳固的时候，他们隐而不显。社会动荡的时候，他们便被激活而彰显势力。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必然能够以他们的生活哲学为中心形成特有的文化形态，并对社会意识产生影响，形成游民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

杜亚泉可能是 20 世纪初期最早关注游民和游民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学者。他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1919)一文中以大量篇幅谈到游民和游民文化的问题。认为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色。^②

我们必须承认游民匪盗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它具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必定表现出一定的文化趋向和特征，形成自身的文化体系，而且作为一种民间的亚文化形态，它有着漫长的历史基础，并不是说匪被剿灭了，游民文化就不存在了、灭绝了，这和匪本身的历史成因有密切关系。匪并非一个社会关系之外的孤立类群，他们是自我们民族历史之中被孕育出来的，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只不过在一种特殊的高压的社会境遇中，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按照一种传统而古老的文化惯性，并不奇怪地完成了匪性人格的形成，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匪好比是乡村大地上的一阵洪灾，洪水过后，河床还在，酝酿匪的社会生态环境一旦形成，它又会聚集成具体的社会现实。所以说游民文化是一种民间文化中的隐性文化，它让几千年的乡村民间总是能在恶劣的生存境遇下毫不费力地延续起这种为匪的古老方式。

更重要的是，在几千年和历史的纠缠中匪渐渐脱离了其历史具体性，进入到一个种群的文化意识层面而演变为一种气质、个性，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匪性、匪气。我们看到，几千年来中国无论是始终被压迫的底层民众，还是跃升为农民压迫者的大人物，晋位为官、为绅、为王、为帝，都很难摆脱“匪基因”。

因此中国人的匪性文化心理是确实存在的，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并非孤立、封闭的意义世界，而是和主流文化互为影响，互为渗透，对于民族文化心

① 王学泰.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M].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7: 24.

② 王学泰.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M].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7: 3.

理的构建发生着一定的作用。正如韦尔斯所说,匪、儒、道同时并存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识之中,无论它们是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①,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取向都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非主流的文化形态像在深水之中的暗涌和潜流,带来一些我们从表面上看无法加以解释的社会文化现象。例如土匪虽然不再作为社会类群存在于现实之中,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土匪在当下却被高频率地使用着,尤其是在影视文化中,匪类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大行其道,久演不衰。因此对于匪的文学—文化辨析是有意义的一种探索方向,无论如何,是到了正视植根于国人文化心理之中的匪情结的时候了。

当代学者陈平原在著作《千古文人侠客梦》里说,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必须拜读儒释道的典籍,但也无法绕开大侠精神^②。在这里可再加上一句,只有探源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黑暗匪性,才能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文学被视为文化的一个部分,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表征,它的审美性、象征性和隐喻功能会使文学叙述与倚重于事件本身的历史叙述之间产生必然的罅隙。表现游民匪盗的文学和叙述游民匪盗的历史就有着这样的罅隙存在,历史叙述和文学想象并不能完全重合。可是孰真孰假,谁更接近真相本身呢?对此历史的研究固然能够接近真相,文学的研究却可能更容易达至对土匪文化现象的意义和本质的深度把握。

既然文学是文化的审美体现,自然也会在历史中逐渐形成反映游民匪盗的文学,中国传统文学中就有许多演绎得轰轰烈烈的绿林故事,并受到民间百姓的追捧和喜爱。最早的游民匪盗文学形象非《庄子》中的盗跖莫属。在对于盗跖这个人物的想象中人们赋予他的文化意义已经体现出超出游民匪盗身份的匪性文化人格的衍生。而古代反映游民文化最为经典的文学作品莫过于《水浒传》。作为集大成的绿林文学的代表,这部作品集中地体现了游民匪盗文化的特征。以《水浒传》人物群像的身份来看,落草于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位好汉,

① 注:大传统和小传统之说,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二元性社会,一方面包括村落,另一方面包括市镇和中心城市,前者为广大农民所占据,后者为社会精英分子所拥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精英分子,即“士”,也就是儒生。由于饱读诗书,熟悉儒学经典,并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一旦他们学有所成,就有可能通过科举或其他途径被遴选为国家官员,以自己的人生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组成自身的“文化”,创造社会的“大传统”,而占人口4/5的普通农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在生活中他们不太信奉儒生们抱住不放的儒学,反而更亲近民间传说,迷信佛教和道教。他们主要被吸引在自己的以农村和集市为中心的村社中,天高皇帝远,自行其是,从而组成他们的另一文化体系,创造了社会的“小传统”。见李安民:《漂泊的大地—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9。

②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上海:新世纪出版社,2002。

纯乎为绿林强盗，所以有学者称《水浒传》就是一部“匪魂颂”^①。《水浒传》所确立的经典游民匪盗形象对后世的匪盗想象有莫大的影响。文学中的游民匪盗叙事值得我们来加以重视还因为，作为一种元叙述，它实际上成为当前影视中的匪类题材模式构成的依据。匪类影视剧在构思情节和刻画形象上，基本上不会脱离从传统的游民匪盗题材小说《水浒传》到20世纪的游民匪盗文学叙事中的类型模式。像2007年出品的大片《投名状》，其中的兄弟落草，结义，背叛，杀嫂，乃至土匪在乱世中的人性挣扎都是在文学叙事中可以找到原型的。

我选择以20世纪这一百年作为对于匪的文学想象进行研究的时间长度是因为20世纪这一转型时期的历史阶段正好对应着土匪这一社会类群从边缘化的山林村寨、城镇边缘地带开始走向历史舞台，并且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走向消亡的历史过程。与之相应的文学匪类叙事一直存在于20世纪的中国小说创作之中，只不过因为其本身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从未成为主流的叙事话语，同时也被文学史有意无意地忽略和边缘化了。比如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就有大量对于湘西土匪悲凉人生的表现，然而人们并没有对此予以归纳和研究。

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学者们这样说过：“人性和民族性毕竟是具体的、丰富的，对其不同侧面的挖掘和强调，有时会因历史行程的制约而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前一段受到批判或质疑的那些品性，在后一阶段却受到普遍的褒扬和肯定”^②。这一点在对于匪的审美表现和审美评价上体现得也极为明显。我们看到，20世纪文学中匪类叙事一直处于动态的和时代紧紧相随的嬗变之中，今是而昨非。由于创作主体强烈的主观意识和外在意识形态对于文本共同构成的压力，匪类审美形象总是在发生扭曲和变形，但通过对文学匪类叙事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把握写作者对于匪这一文化符号的认识以及对匪进行审美想象的意图，让我们接近时代嬗变之中一种真实的历史关联和文化本质。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新鲜而有趣的探索。

20世纪初期，西方异质文化的传入令历时两千余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发生变革。五四新文学的产生使现代普遍的一些价值理念开始进入到作家们的

① 陈洪，孙勇进。漫说水浒[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3。

②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9。

创作意识中，这也必然影响到文学中对于游民匪盗形象的表现，使作家们笔下的游民匪盗不再同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宋江、李逵之辈。

《水浒传》所体现的游民匪盗形象多是英雄好汉的正面形象。施耐庵本人下层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份决定了作者看待这些绿林好汉，是以一种肯定、认同，缺乏批判性的视角，视这些绿林好汉的暴力为常态，认同他们混乱的侠义观，肯定他们的人生选择方式，体现出一种与正统文化意识既相联系又相悖离的民间文化立场。而20世纪开始的匪色文学想象与此既相联系，又截然不同。

根据匪想象在20世纪的嬗变过程，本书分三个时期来论述，分别是“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再将“新中国时期”分为“建国十七年”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它们分别对应了20世纪中国文学匪想象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较好地反映了土匪现象的历史变迁以及其文学想象与社会、政治、民族、文化等概念的对应关系。

首先由于知识者本身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及他们的精神和思想结构中的西学资源，写作者们看待游民匪盗题材所采取的视角和立场、对游民匪盗生存方式的理解和表达都和古代知识分子有截然分别。对于匪进行思想认知、精神审视和审美表现时也就不同于《水浒传》为代表的传统游民匪盗想象。总体而言，最初是在一种现代启蒙话语的思维中，写作者们进行现代游民匪盗审美形象的建构，在表现游民匪盗时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历史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在民国时期的匪想象中，现代写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幕幕在作者悲悯观照下的土匪世相。这时我们不仅看到作为人而存在的游民匪盗生存状况，而且可以看到他们具有的或卑微或辉煌的梦想，他们那几乎与农民没有差别的人生看法。他们是被抛离社会正常秩序之外的边缘人，然而他们同样体现出生的顽强和挣扎，不仅如此，还体现出野兽般争取生存的凶残面目。他们的人生也是社会人生的一种，没有理由被忽略和抹去。游民匪盗的故事还被融进了地域的文化风貌，反映了土与匪之间的紧密关系，匪无疑是乡土中国的另类风景，一道黑风景。

十七年文学时期，对于革命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捍卫，使文学匪想象缺少了民国时期的丰富性，但在对于土匪的表现后面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匪想象的绝对控制和利用，并且人们内心暗涌的匪性以及传统英雄观的根深蒂固使匪想象逸出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外，塑造了另一类匪想象——体现了匪性气质的英雄人物。

新中国以来，土匪成为了历史中遥远模糊的背影，但作者和读者对于这一

题材似乎乐此不疲，匪类文学叙事开始呈现出纷纭杂陈的众声喧哗之态。和借土匪反映社会人生的民国时期那种向外探寻的意图不同，土匪成为了写作者表达自我的人格镜像，匪性文化人格再一次借土匪的外在身份得到宣泄和体现。同时在新历史主义的观照下，写作者也借土匪的历史身份开始对历史和人性进行较为深层的开掘和反思，比如《白鹿原》中的黑娃就是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土匪审美形象。

一方面增强了匪想象的文化色彩，另一方面又借匪叙事来反映一种质疑历史、具有解构性质的新历史主义态度，从乔良的《灵旗》、陈忠实的《白鹿原》到莫言的《红高粱》，从贾平凹的“逛山”系列小说到 20 世纪末的土匪小说都体现了这些特点。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反差极大的土匪影视形象也获得受众的极大欢迎，那些匪性气质很浓的英雄形象被观众所偏爱，这使土匪形象在文学和影视艺术中得到继续的演绎和发展。

20 世纪的匪想象中还包含了现代写作者对于匪的一种复杂情感和认知。这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处于启蒙立场的对于下层和民间的关注——土匪也是人；对匪性气质的原始力量的赞扬也体现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民族焦虑。不仅如此，在对匪的想象后面还有着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诉求和控制，通过对匪色文学话语的剖析，本书还将阐释文学想象与政治文化的互动，以其个案折射出历史演变的轨迹。总的来说，匪想象以及现代游民匪盗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意识下对传统游民匪盗想象的审美改造，匪类文学叙事在 20 世纪政治的风云际会中也完成了它自身的现代审美转型。

在论著的结语部分再回到土匪的本身，探讨 20 世纪中国文学对这个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社会类群的文学想象所体现的民族文化性格，从而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借文学看到了土匪文化和匪性意识的存在，那么我们何时又以怎样的方式才能摆脱这样一种黑暗时代遗留的匪文化情结呢？我试着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我对于文学匪类叙事研究和思考的一个句号，尽管这个句号并不圆满，但至少有足够的诚意。

关于匪的历史文学研究现状有必要稍作介绍。匪，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类群，因其本身的社会性质，始终处于历史叙述的边缘状态，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对于游民匪盗的史学研究已经被逐渐重视。20 世纪上半个世纪的土匪问题，到 90 年代始为中国史学界注意，这还得益于西方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出现的史学新思潮。当时一些年轻的西方史学研究者开始反对传统的史学仅仅注重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的倾向，提出历史学家应当关注普通民众。在这一史学思潮的背景之下，英国社会史著名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

1969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土匪》的专著。在这一史学思潮的推动下,英国学者贝思飞积十年工夫,专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民国时期的土匪》,于1988年出版。西方学者称该书是“民国土匪活动第一部综合研究专著”。事实确是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民国时期的土匪有过不少记载,但根据《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版和1983年版)公布的《1912~1948年中国历史书目》,在民国时期的30多年中,从未有过一本土匪史问世。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比较注重于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土匪一类下层社会和社会病态现象的研究,尚未引起重视,以致在这一领域中几乎形成一片空白。只注重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民国史研究,对土匪有时也有所涉及,但都不是以土匪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对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正式开始了对土匪一类下层社会和社会病态现象的研究,很快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近代中国土匪实录》、《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中国帮会史》、《中国地下社会》、《流氓的变迁》等^①。尤其是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和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两部著作从社会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于游民匪盗的历史现象提供了新的思维视角。让匪现象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对了解匪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以及真实的存在状况具有很大的价值,为理解现代文学的土匪形象提供了新的思维视角。

对匪的史学关注体现着一种重新审视历史的眼光,即普通民众和下层人民的视角,因为匪有着根本的民间属性。从文学角度考察匪现象应该是对全面了解匪这一历史现象的丰富和补充。然而在文学研究领域,除个别对于匪类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论文外,系统地对匪题材的小说进行整理和论述的专著还未出现。

较有影响的有关论著有逢增玉在其论著《黑土地与东北作家群》中对于东北胡子专辟一章《历史、文化和审美视角下的特殊人生评判》进行的精彩论述。另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中第四章—《革命·匪·英雄传奇》,还有蔡翔的论文《当代小说中匪形象的修辞变化》,王寰鹏的著作《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当代阐释》中部分对匪英雄阐释的章节,刘忠的《英雄·白痴·匪》,赵德利《匪审美:民间权威的文化阐释》(《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4),王达敏《史学新思潮与文学新形象——论90年代小说中的社会匪形

^① 王达敏. 史学新思潮与文学新形象论 90 年代小说中的社会土匪形象 [J]. 安徽大学学报, 1997 (6).

象》(安徽大学学报, 1997. 6), 阎秋红《人性与民族性的参照——论八九十年代土匪题材小说的一种倾向》(《文艺评论》, 2002. 5)。

这些著作和论文均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匪叙事加以细致的研究。尤其是黄子平先生的《革命·匪·英雄传奇》一文从匪想象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出发, 见解犀利深刻, 十分具有启发意义。总的来说, 对于匪的文学想象进行全面研究是一个尚未有前辈学者涉足的新课题, 是一片未经开垦的文学批评处女地。

本书所涉足的匪色文学叙事外延比较广泛, 并不仅仅限于那些表现具有游民匪盗身份的文学人物叙事。本文对匪的文学研究, 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的区别。狭义的匪是指历史现实中具有游民匪盗身份的社会类群及其文化形态, 这是本书文学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对象。但本书研究的主要视域却在广义的匪的概念上, 即既有对土匪审美形象的本体化研究, 也有更深层的对泛化的匪性意识和匪性文化心理的文化研究。

对此当代作家尤凤伟的观点颇足取, 他认为匪性文学的外延可以放开些, 除了落草为寇的正宗土匪外, 还有在心情上与之极为靠近的乡村浪人、无业游民、三教九流等, 从广义上都可以一起作为研究对象^①。有鉴于此, 本书将包含土匪人物形象或游民匪盗事件的所有文学叙事称为匪类文学叙事。

毫无疑问, 匪的历史叙述和文学虚构是不一样的, 现实与想象之间, 百年文学留下了匪的点滴足迹, 在历史、文学和文化之间构筑了一架可以互相映照和关联的桥梁, 或者说匪的文学想象就是一个关于历史和文化的镜像, 如同倒映在水中的影子, 历史已经成为陈迹, 文化已经积淀在民族无意识之中, 只有文学, 以审美的方式勾勒出匪随时代变迁的身影。

^① 尤凤伟, 王光东. 关于一种创作倾向的对话. 来源于当代中国文学网 [EB/OL] <http://www.ddwenxue.com>, 2008-08-21.

第一章 现代匪想象的历史起源

探讨对匪的文学想象，必须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中对匪及匪的想象寻根溯源。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确切的关于“匪”的概念，必然无法把握作者们选择匪来进行审美想象的意图。任何一种写作和叙述活动都是存在于历史文化之中的，因此知识者的创作思想中有着先验的对于想象对象的认知图式。把握了匪的文化渊源，我们就理解了知识者想象匪的精神资源和创作意图。

对匪的观念考察，首先恐怕要从匪的文字学考古入手。

第一节 “匪”字考古

对于“土匪”这个词，人们并不感到陌生，游民匪盗自古有之，宋代刘敞在《患盗论》中说“衣食不足，盗之源也”，民“非不畏死也，念无以生，以谓坐而待死，不若起图生也”^①。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解释中国游民匪盗的存在：

中国和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当人民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便逃往四方去谋生；结果各地盗贼便三三两两结伙成群了。多半的贼帮在初期就被消灭了；其他的增大起来，可是又被消灭了。但在那么多而且又那么遥远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帮恰巧成功了。它便维持下去，壮大起来，把自己组织成为军事团体，直接向首都进军，首领便登上宝座”^②。

在严酷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挣扎生存的老百姓，一旦连最起码的生存也难以维持的时候，就不免要铤而走险，踏上违法和造反的道路。在漫长的古老岁月中，这种民众的造反形式主要是起义（暴动）和为匪（盗）。只是土匪这个

① 宋文鉴卷 95《患盗论》。

②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53-154。